

引 言

一 文化及文化学的概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系统之中，文化无所不在，谁也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行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创造文化、选择文化的过程。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文化交流，冲开了民族壁垒，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改革的潮流，在世界各地掀起。社会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问题上来。一方面，我们的时代要求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新文化；另一方面，作为传统存下来的文化，既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成分，也有与改革相冲突的因素；还有，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对待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外国文化。于是，便引发了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冲突与论争。基于此，文化成为当今人们普遍关注并展开论争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文”甲骨文写作，像人身上刻有花纹形，本义是文身，

引申为花纹，再引申为文饰，如成语“文过饰非”中的“文”即是此义。“化”小篆写作，左像正人，右像反人，合在一起表示变化的意思，引申为教化。“文化”一词在我国的出现，至迟可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我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意思是指文治教化，即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礼乐典章制度对人的制约与感化。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在我国一直保持到近代。

我们今天常用的“文化”一词，其意义显然与古代不同，它是 19 世纪末通过日文转译从西文引进的。这个词的英文、法文均为“culture”，德文为“kulture”，它们都是从拉丁文“cultura”演化来的。拉丁文“cultura”本意指耕作，后引申出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意思，现在的英、法、德等语种还保留了拉丁文的某些含义。

以上我们对文化的字面意思作了解释，那么什么是文化的科学含义呢？据《大英百科全书》的统计，对文化含义的阐释，在西方历史上有 160 余种，如果加上中国人的解释，大约有 170 多种。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在文化的定义上见仁见智，众说歧出。如有“理性的实体”、“理想的类型”、“社会的遗传”、“行为方式的总和”、“工具和制度的造作”、“民族精神的体现”、“人的能力的增长”、“生活模式”等等。^①看来文化是一个因其内涵的不确定而导致外延不确定的模糊概念。我们比较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指人类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状态。文化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客体是整个客观世界。所谓文化不是不受人影响而自然形成的自然物，而是人在社

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第 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会实践过程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创造和保存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总合整体，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①

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并阐释文化的性质、特征、内容、形式、结构、功能、类型和变迁，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即是文化学，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文化学是在近代西方逐步发展起来的。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文化学脱胎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是文化学的萌芽阶段。此时期的代表学者有法国的孔德、英国的斯宾塞和泰勒、美国的摩尔根、德国的克莱姆等。文化学的建立始于 20 世纪初，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于 1909 年发表《文化学的能学基础》，提出了“文化学”概念。美国学者怀特于 1949 年著《文化的科学》，又于 1963 年著《文化进化》，人们称他为“文化学之父”。19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形成了许多研究文化学的学派，如进化学派、播化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等。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西方文化学研究的各派观点多有引进。

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的集合体，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硬件”和“软件”。因此，文化结构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部分，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产物，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文化，是人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认识、掌握、改造世界的创造力量和发展程度的表现。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必须进行生产活动，

参见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 3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必须进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因此，物质文化是整个个人类文化的物质基础。

精神文化是人们在精神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称，包括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政治、法律、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理论、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组织机构。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谓区别是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人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创造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不同的。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二者之间的联系、统一是绝对的。物质文化为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虽有区别，但不存在着“开阔地”，它们之间有一个中介体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中介体就是各种社会制度，诸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正是由于社会制度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所以文化结构又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这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包括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又由于意识形态可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部分，因此，文化结构又可以细分为五个层面：

第一，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状况。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这是整个文化结构的最底层面。

第二，反映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三者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决定着物质文化的性质。生产关系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文化关系的物质基础。

第三，连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体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制度，还包括受经济制度制约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

第四，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一个低层次，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在意识里的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客观内容的反映，包括感情、情绪、信念、意志、风俗、习惯、德行（如忠贞、刚毅、勇敢、正直）、情操（如同情、慈悲、义愤、爱情、热心等）、信仰（如敬畏、虔诚、佩服、信赖等）、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民族性格等等。

第五，思想体系。思想体系是升华了的社会意识，是系统化、理性化、理论化、抽象化的社会意识形式。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科学理论、艺术、文学、美学、教育、哲学、宗教等等。这是精神文化的高级层次。^①

二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结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悠久历史演化而成的一种经久起作用的文化，即是中华各族人民长期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表现，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这些内容有的起自奴隶制时代，甚至更早，有的起自封建时代，也有起自近代中国的。把传统文化界定在古代，或者等同于封建文化，都是不准确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结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

参见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深厚基础。

第二，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早在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公社就已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细胞和历史的基本事实。进入奴隶社会后，它演变为奴隶制的森严的等级关系和阶级关系。到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壤。皇帝、贵族、地主和农民，君臣父子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因此，“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宗法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封建文化极为重要的内容。

第三，在小生产自然经济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宗法等级的社会制度。包括宗法等级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它们是适应和表现宗法等级的生产关系的制度规定，并为之服务的。

第四，在顽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家庭血缘宗法等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下和作用下，形成和积淀起来中国传统的稳定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文化心理结构。

第五，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结构的不断加工、升华，使之系统化、理性化、理论化，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体系。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伦理道德、科学理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而其中宗法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宗法伦理道德纲常及其理论上的集中代表——儒家的礼教占据意识形态的“一尊”地位，具有

“无上权威”。^①

三 西方文化及其特点

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三个主要的类型。西方文化的起步要比中国晚得多。当中国的夏王朝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欧洲基本上还处于一片蛮荒状态。欧洲的文明来源于东方。地中海东部靠近小亚细亚的克里特岛上的与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同出一辙的米诺斯文化最早影响到欧洲。欧洲文化的来源有三，即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即基督教文化）。

1. 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的精神是注重自由、现世的欢乐，最突出的成就是哲学与科学。

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苏氏偏重道德哲学；柏氏主张由真知达到德性，他所著的《理想国》为西方伦理、政治的重要经典；亚氏是最博学的人，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伦理学方面，他将柏拉图的四基德扩大为十德；在政治方面，他主张道德政治；他所著的《伦理学》，是一部哲学巨著，是讲求思想方法的重要著作；他还研究动物学，是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总之，亚里斯多德的多方面贡献使他成为西方学术思想的权威。

希腊的科学，如几何学、天文学、数学、原子学说、物理学都很发达，成为今天西方科学的源头，其中德谟克利特、阿基米德都是伟大的科学家，对后世影响很大。

参见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希腊科学、哲学发达，它的哲学常从个人人生直透到宇宙万物，但缺乏政治，因此希腊始终停滞在城邦政治，而不能建立成一统的国家，这是希腊文化的缺点。

2. 罗马文化

罗马文化讲求政治法律，组织权力，所以它的突出成就在政治与法律，一切国家大事都由元老院议决，元老院议员是由有财产的市民选出来的；法律方面，公元前 451 年，罗马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就议定了《十二铜表法》，这是罗马有成文法之始。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起源于公元前的罗马共和时代。罗马文化中权力组织高于一切，谈不到道德，纵使有，也只是政治道德而已。

3. 希伯莱文化

希伯莱文化是宗教哲学的文化，是出世的，悲观的。希伯莱种族最初居住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迁到巴勒斯坦地区，再迁埃及。到埃及后，受到法老的歧视和虐待，于是希伯莱民众在其酋长摩西的带领下，又回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并建立了国家。在大卫王统治时期，建都耶路撒冷。到了大卫儿子所罗门王统治时期，国家逐渐强大。所罗门死后，国家分裂成两部分，一为犹太，一为以色列，以后此二国分别被罗马与亚述所灭亡。希伯莱民众在长期流离迁徙和被人欺凌中认识到，欺辱他们的人固然有罪，而他们之所以常受压迫，也是因为有罪的原故。因此，他们仰望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耶稣就在这种仰望期盼中来临了。不过耶稣认为不仅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一切苦难的世人，因此耶稣教义具有世界性。当日耳曼人南侵，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时，耶稣教会把罗马人的法律组织引入到教会里，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力量，把强大的征服者日耳曼人教化了，从而形成了宗教控制政治的局面，使一切学术思想、科学艺术都成了宗教的附庸，造成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公元 500—1500 年），于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便有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文艺

复兴是希腊文学、艺术精神的复苏，是个人现世自由欢乐主义的复兴；宗教革命是政教分离的复兴。由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才有现代西方国家的产生。

文艺复兴后，西方文化趋于活泼繁荣，特别在科学方面，相继出现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银河系的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微积分；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巴斯德的细菌学；汤姆逊的电子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这些科学上的伟大成就，造成了今天的知识爆炸、物质文明，也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西方文化就是揉合了这三方面的文化而形成的。主张个人自由、重视科学研究是希腊精神；讲求民主与法治、主张向外扩张领土是罗马精神；主张互助博爱耶稣精神。

我国著名学者陈独秀、梁漱溟都坚持西方文化的精神是科学与民主的观点。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西方文化面临的是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如何求得生存。梁氏在其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所有衣、食、住，种种物质的需要都是从自然界取得的，所以，这时态度当是向前要求的，就着前面下手的，对外改造环境的，以力征服障碍的。若不向前想法子而就着自己这面想法，那就不成功……那么就不得生存。

向前要求以满足欲望的西方意欲趋向产生了两个基本态度，科学和民主是其具体表现。朝向外在世界的知性计算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利己和谋求个人权力导致了民主的产生，现代西方文化是这两种态度逻辑发展的极点，而这两种态度又都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古希腊的怀疑论哲学家提出以‘个人利’为评价人物活动的唯一标准；苏格拉底把知识与道德相提并论，尤其强调理智。西方文化就是完全的自私和理智的运用。从古希腊时代起，大多数西方哲学家主要从事于对自然世界的理性研究——认识

论、宇宙论——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西方文化的一切特征——合理化的、竞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宗教的衰落，对法律、权利和个人的强调——都是从这里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文艺复兴使西方文化恢复了正常的发展，西方人的根本态度也由此回归到了希腊时代的样子。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成就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当然，“世界的发现”是科学的兴起。此时，希腊的理性主义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补充。批判的理性主义摧毁了宗教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英国的经验论者则把利己和知性的计算这两个根本的态度，与西方的普罗米修斯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了现代工业的产生。文艺复兴的“自我发现”，促进了民主的发展，这种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个人的权力基础之上的：从积极方面来说，保证个人的充分发展；从消极方面来说，保证个人的自由在确定的行为范围内不受社会和其他个人的干涉。实际上“个性的伸展对于个人的社会性的发展”而言，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民主提供了有效的社会组织，但同时又保护个人使其个性不受社会组织的扼杀。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意识产生了西方民主这一伟大成就：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既然个人都享有参与组织决定权，那么个人就不是组织的附属品；组织对个人自由的保证，又使个人感到在不放弃自己自由的前提下有必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个人和组织相互依赖，不能分离，没有个人的组织或没有组织的个人都是不能存在的。

个人自由与自我意识不仅对个人有价值，而且对于集体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个人力量的发挥也就增强了社会团体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私自利，西方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殖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个人对社会的积极参与，著名的西方公众精神与民主也是不可能的。

西方文化对“自己”与“我”的承认与肯定，必然导致利己和向着自然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享的西方态度。作为西方人的知

性计算的一个后果，“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混然不分的，而在这时节被他打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西方人把自然界仅仅看作是满足自己欲望，被利用、被征服的对象。这种态度也表明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现代西方人的理智太强太盛。虽然它在知识与财富方面获得了巨大增长，物质生活也极为丰富，并取得了其他许多令人钦佩的成就，但它也使“精神上”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

梁漱溟认为：“西洋人自秉持为我向前的态度，其精神上怎样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罅隙……罅隙愈来愈大，很深刻地划离开来，就弄得自然对人像是很冷，而人对自然更是无情。无复那古代以天地拟人而觉其抚有万物，像对人类很有好意而人也恭敬它，与它相依相亲的样子；并且从他们那理智分析的头脑把宇宙所有纳入他那范畴，悉化为物质，看着自然只是一堆很破碎的死物，人自己也归到自然内，只是一些碎物合成的。”西方人为了个人利益的知性计算，便把“（他们的）宇宙和人生断裂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殆垂绝”。①

西方人也不可能从他们同伴那里获得任何安慰，因为“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像是觉得只有自己，自己以外都是外人或敌人”。甚至家庭也受其影响，“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要算账，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

由此可见，理智的计算导致的科学、利己主义导致的民主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物质的知性计算与利己两种倾向结合的必然结果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达。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辽宁大学哲学系自编教材。

四 中西文化的主要区别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为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提出了“挑战与回应”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该民族对其所生存的环境所作的挑战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每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对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的两个重要的文化体系，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可以用“挑战与回应”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太平洋西岸的欧亚大陆的东部平原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一地区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南部是印度洋，西南是横断山脉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西北部是戈壁荒滩，北部是古人为防御外族侵略人为修建的万里长城。该区域平原广阔，土质肥沃，河流众多，人口密集。人们在这种自然兼人为的封闭的生活环境里进行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就具有浓厚的封闭性与内向性。在这种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就走上了反省内求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注重向人的主观世界寻求，向人的内心世界寻求。这种文化追求所产生的结果则是关于如何“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观念与规范，伦理道德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伦理道德型的文化。

西方文化产生于欧洲，欧洲位于欧亚大陆的西部，西临大西洋，南濒地中海，东南是黑海、里海，北临波罗的海、北冰洋，东部以乌拉尔山脉与亚洲相邻。欧洲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适于发展海洋贸易、海洋运输。欧洲土地面积狭小，平原少，山地、丘陵较多，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欠佳。这样，古代欧洲

人自始就注重利用海洋的优势，发展海洋贸易与海洋运输等商品经济。商品生产与交换成为古代欧洲经济的一大特色。商品经济具有开放性与外向性的特征，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欧洲文化也就具有了外向性与开放性的特征，就是说西方文化一开始走的是向外部世界寻求的道路。古代欧洲人向外部世界寻求并对这种寻求过程与结果进行知性计算，这就产生了自然科学，故西方文化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为重心，西方文化就成为自然科学型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中国传统文化以静止、和谐对称、直觉思维、整体、性善、人治、中庸、平均主义、循环论为本位。

西方文化以运动、斗争战争、分析思维、个体、性恶、法治为本位。

以孔子、孟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文化主张“宁静致远”；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主张“清静无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儒道互补型的文化，这样静止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了支配地位。

儒家文化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和谐对称成为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建筑上，导致以和谐对称特征的四合院民居的产生；在历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出现过汉代与匈奴的“和亲”（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明代与北方少数民族瓦剌的“和亲”；现代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思想在现代政治外交中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都注重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就是主体在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前提下，未经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

接获得某种知识的能力，突然发生认识上的质变与飞跃，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儒、道、释三家都提出了丰富的直觉思维观念，从而使直觉思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直觉思维是灵活多样、瞬息而现的，它有利于人们动态地把握整个世界，但直觉思维也有弊端，它不注重定量分析，以直觉思维所获得的结论具有不精确性、模糊性，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明显的不精确性、模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定量分析是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必备条件，由于不注重定量分析的直觉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就限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以直觉思维为主导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体本位思想的产生。直觉思维的特点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儒家代表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道家代表庄子提倡“与天地并生，而与万物为一”；新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发展了这种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念，他曾这样解释国王的“王”字，上下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皇帝，皇帝作为天的儿子（天子）秉承天的旨意来统治人间，这样就把天、地、人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董仲舒的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但却体现了中国古人朴素的整体观念。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的思维观念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中国人的姓氏是家族整体的姓在前，家族个体成员的名字则在后，而西方则相反，家族的姓在后，个人的名字在前。中国传统文化先强调整体，把整体置于首位，忽视个体，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义务与责任，轻视个体的权利。这种整体思维观念的现实表现就是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性论上，突出强调性善，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他举例说，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爬在井边有掉下去的危险，立刻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怕小孩掉下

去，想法去救他，这个人与小孩的父亲不是老朋友，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也不想得到乡亲们的夸奖，没有多加考虑，他的恻隐之心是真情实感，是自然感情，是内在的。孟子认为这就是人的先天本性，这种本性当然是善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都是善的，不是外力强加的。这种人性善的学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构成了德治、入治的理论基础。

在治国形式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人治”，主张“贤人政治”。儒家是“人治”论者，它把政治看成个人道德的扩大，注重并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则着重对人与法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强调人起着决定法的作用，“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种人治论在儒家文化处于一尊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起着主导作用。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色，孔子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前提下，总结与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中庸思想就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以执中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具体运用就是用中求全的实践辩证法。中庸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庸之道几乎成为正统的行为哲学的代称。

平均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损有余而补不足”，儒家孔子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这种思想观念对后世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早期农民起义大都是在“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旗帜下进行的。宋代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向广大群众

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用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钟相则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则将这一“均贫富”思想发展成为“均田免粮”的纲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则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平均主义口号。甚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治国思想中也有鲜明的平均主义色彩。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循环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色。孟子曾说：“天下之势，曰一治一乱。”认为人类社会是在治与乱的循环中向前发展的；阴阳家则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因素的相生相克，导致了人类社会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这种历史观上的循环论对中国古代社会王朝的循环更替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封建社会在朝代的恶性循环中停滞不前。

西方文化在静止与运动中更注重运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一切皆流”、“万物在变”的观点，认为运动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是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他曾用“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运动的绝对性。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则将这一观念推向了极端，指出“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从而将运动神秘化了。

西方文化以运动为本位产生了它以斗争战争为本位。赫拉克利特曾说：斗争是万物之父，战争是万物之母；德国著名思想家黑格尔在其著名的《权利哲学》一书中曾指出：每个国家的主权在其外交活动中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不能用相互协商来处理的国家间的争端，只能靠战争来加以解决。黑格尔把这种战争制度看作是维护民族内部健康和活力所必需的和有益的制度，这一理论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前 50 年，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抢夺原材料、能源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活动，其间发生的国家之间的冲突、纠纷与矛盾，导致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以说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与精神痛苦的两次世界大战是由以斗争战争为本位的西方文化所蕴育出来的。

分析思维是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分析思维在探讨对象时，是将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对各个部分进行细致入微的精确研究。这样分析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定量分析，人们运用分析思维所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严密的精确性、逻辑性，而定量分析、精确性、逻辑性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必要条件，故以分析思维、逻辑思维为本位的西方文化发展出了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发达的自然科学与技术。

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思维导致了它注重个体。分析思维将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研究，这就把部分、个体突出了，将部分、个体置于首要位置，这样西方文化中就产生了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念将个体、个人作为社会的逻辑元点和价值元点，反映在民法上就是权利本位观念。权利本位则成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权利本位产生出了西方的人权观念、民主观念，西方的法律由此发展起来。罗马法即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典法，它影响以后整个世界的法律文化。

西方文化的另一特色是主张性恶，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基督教《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让他们在伊甸园中生活，并给他们制定了戒律。他们违背了戒律，偷吃了禁果，犯了罪，惹怒了上帝，上帝将他们驱逐出伊甸园。由于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生来就有罪（原罪），人生下来就要赎罪，这就是基督教的性恶论；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与人是狼与狼的关系；著名哲学大师黑格尔则明确地肯定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对此在《路